

英汉词典历史文本 与汉语现代化进程

胡开宝摇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总摇摇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它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 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2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3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化翻译

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它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它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8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拿大的罗

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65年与1968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1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1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猿位之外,其余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1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远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7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绪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它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之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二〇〇九年 怨月 愿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轶
摇摇词典与语言	轶
摇摇现当代词典学研究述评	轶
摇摇本书的研究内容、方法及意义	轶
摇摇本书的结构	轶
第一章 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	轶
摇摇概述	轶
摇摇我国英汉词典史简要回顾	轶
摇摇1951—1977年间英汉词典编纂史	轶
摇摇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汉语现代化进程	轶
第二章 英汉词典文本性和文本属性	轶
摇摇概述	轶
摇摇英汉词典文本及文本性	轶
摇摇英汉词典文本 权威文本	轶
摇摇英汉词典文本 准效应文本	轶

目 录

Contents

第六章	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现代汉语构词法	轱辘
	遥遥概述	轱辘
	遥遥英汉词典历史文本与现代汉语词缀	轱辘
	遥遥英汉词典历史文本的译名与汉语多音化趋势	轱辘
	遥遥英汉词典历史文本译名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轱辘
	结论	轱辘
	参考文献	轱辘
	附录遥遥员一员年间汉语外来词词表	轱辘
	后记	轱辘

摇

引摇摇言

目录

词典与语言

词典是记载语言的历史,它忠实地记录着语言基本要素词汇的意义和用法。词典是语言的法规,人们“常常查阅词典寻找规范”。^①词典是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钥匙。古往今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产品之一,词典的问世和演变无不与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息息相关。

在欧洲,无论是英法德等大国,还是波兰、丹麦和克罗地亚等小国,词典的编纂均起源于为阅读圣经所编写的拉丁语—拉丁语词汇表、拉丁语—本族语词汇表。据历史记载,约公元五至七世纪,英国教士和学者为了方便人们理解圣经教义,在福音书上用浅显的拉丁语词汇解释拉丁语难词,或用英语解释相对应的拉丁词语。公元十一世纪克罗地亚出现拉丁语—克罗地亚语词汇表。十六、十七世纪,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逐步扩大,国际贸易和不同语言文化间交流的日益增多,双语词典成为欧洲词典编纂的主流。1606年,克罗地亚最早的词典也是第一部双语词典出版发行。该词典为克罗地亚语—意大利语词典,由一位西班牙犹太人皮托

^① 词典是记载语言的历史,它忠实地记录着语言基本要素词汇的意义和用法。词典是语言的法规,人们“常常查阅词典寻找规范”。
 词典是不同语言文化沟通的桥梁,是人们认识世界的钥匙。古往今来,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化产品之一,词典的问世和演变无不与语言的运用和发展息息相关。

(《粤汉词典》) 指出, 在 18 世纪编纂的匈牙利语词典。它是匈牙利第一部单语词典。之前, 匈牙利一直未曾出版本族语单语词典。“词典”(词典) 在匈牙利语中主要是指双语词典。

“词典是作为实际工具而不是作为理论工具产生的……不同文化孕育了适合于各自需求的词典。”^①以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各国的词典编纂发展轨迹不同于以基督文化为代表的欧洲各国。在阿拉伯国家, 单语词典是民族词典编纂的发端。18 世纪以前, 几乎没有任何英语—阿拉伯语或阿拉伯语—英语词典。随着西方各国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 英语—阿拉伯语词典相继问世。1820 年第一部阿拉伯语—英语词典出版。该词典由爱德华·威廉·莱恩(爱德華·威廉·萊恩) 编写。1858 年, 乔治·巴杰(喬治·巴杰) 编写的第一部英语—阿拉伯语词典出版。这些双语词典的出版有力地促进了当时阿拉伯和西方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中国, 词典编纂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字书《史籀篇》。这部字书主要解释汉字字义等, 供儿童识字用。公元 100 年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基本完稿。这是我国第一部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和辨析字音的字典。汉代, 我国出版了最早的单语词典《尔雅》。它收录了汉代以前的古汉语词语, 解释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和用法, 成为一部“释古今之异言, 通方俗之殊语”的历时性词典。这些字典和词典的问世对于汉语的使用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规范作用。到了近现代, 单语词典的编纂呈现出蓬勃生机。《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和《汉语大词典》先后面世。这些词典不仅被看成语言规范的重要工具, 而且被视为民族文化的象征。

① 粤汉词典 编纂委员会 编, 《粤汉词典 卷首语》,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园题

现当代词典学研究述评

园园园摇概述

词典编纂源远流长,前后长达数千年。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词典对语言和社会的影响,总结出系列规范词典性质、词条收录及其释义的理论原则和编纂方法。悠久的词典编纂实践和丰富的词典编纂经验为词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词典学理论一直处于自发的感性认识阶段,始终未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一,人们过分强调词典编纂的实践性,甚至其理论和实践混为一谈。他们认为词典编纂经验就是理论;其二,词典编纂一直被认为属于语言学范畴。词典编纂主要涉及词汇的意义和用法,而语言学分支词汇学研究词源、词汇变化以及词义等。由于两者存在诸多共性,人们自然而然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词典学及其它相关学科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词典编纂所涉及的领域远远超出语言学范畴,它还与认知科学、符号学、教育学以及信息科学等密切相关。兹古斯塔(在译)指出“词典编纂是其语言活动直接影响许多人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之一。就所花的时间和金钱而言,它是昂贵的(相对于人文学科的衡量标准),也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如此,只是在不久前人们才认识到词典学可以作为理论、方法和程序的整

体,适用于各种语言资料。”^① 词典不仅包含了理论和语言学内容,而且还与社会和历史因素相关。”^②许多学者主张将词典学从语言学领域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学科进行理论研究。他们开始从不同方面系统研究词典的本质和类型,词典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词典与其它学科关系,力图构建词典学的理论框架。因而,词典学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并日益拓展、深入。

英国理论词典学研究

理论词典学是词典学理论构架的基础,与词典编纂实践构成词典学整体。理论词典学一般涉及与词典及词典编纂有关的原则和理念,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影响到词典学作为独立学科能否最终形成,而且关系到词典质量的高低。基于这一认识,词典学界在该领域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理论词典学因此成为现代词典学研究的主臬。要建构理论词典学,首先要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一些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德国词典学家 匀·耘·威甘德(匀·耘·威甘德)教授提出词典学理论应分为五个不同领域,即词典文本的文本理论、词典类型学、资料的收集和和处理理论、词典结构理论和词典目的理论。^③弗兰兹·约瑟夫·豪泽曼(云·耘·扎)主张理论词典学理论主要包括词典编纂理论、词典批

① 匀·耘·威甘德,《词典学理论》,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② 匀·耘·威甘德,《词典学理论》,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③ 匀·耘·威甘德,《词典学理论》,柏林:德意志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